

李鴻章的功過

陶懷仲

家世功名。志氣風發

李鴻章（一八二三——一九〇一）是安徽省合肥縣人，字漸甫，號少荃，排行第二。父名文安，道光十八年（一八三八）進士，官至刑部督捕司郎中，記名御史。長兄瀚章，後來做到湖廣和兩廣總督，也是封疆大吏。三弟鶴章，四弟昭慶，官皆不顯。李鴻章在道光二十四年（一八四四）恩科順天鄉試中的舉人，三年之後，赴京應試，途中曾賦詩言志：

「男兒赤手把吳鉤，意氣高於百尺樓。
一萬年來誰著史？三千里外覓封侯」。

李鴻章爾後叱咤風雲，鋒芒於此初露。時值道光二十七年（一八四七）丁未科，鴻章中式二甲三十六名進士，朝考點庶吉士，入翰林院教習，時年二十四歲。年少高科，春風得意。以後他直上青雲，做過大學士、北洋大臣、總理衙門大臣、商務大臣、江蘇巡撫、湖廣、兩江、兩廣和直隸總督，煊赫聲威，馳名中外，中堂物望，位極人臣。

按明代始置總督，其時總督有管轄地方與專務兩種。例如總督河漕，總督漕運，是管轄專務之總督，如總督某處軍務，是管轄地方之總督。

但管轄地方之總督，亦有帶管專務者。其總督管轄之地方，並不按當時所設布政使司（通稱爲行省）之定制，每一總督所管轄之廣狹與分合，皆臨時以敕書規定。據史所載，明英宗（一四二七——一四六四）景泰三年（一四五二），命左都御史王翱（一三八四——一四六七）總督兩廣軍務，自總兵以下，悉聽節制。然尚非常設。至明憲宗（一四四八——一四八七）成化中以韓雍（一四二二——一四七八）總督兩廣兼巡撫廣東，開府於梧州，始爲定制。清代大體仍沿明制，而略加整理。定制直隸一人，江南江西一人，福建浙江一人，湖北湖南一人，四川一人，陝西甘肅一人，廣東廣西一人，雲南貴州一人，共爲八人。在公積中，江南江西稱兩江總督，福建浙江稱閩浙總督，湖北湖南稱湖廣總督（湖廣之名沿於元代，後雖劃分，而仍舊名未改）。陝西甘肅稱陝甘總督，廣東廣西稱兩廣總督，雲南貴州稱雲貴總督。其駐地，則直隸駐保定（末期輪駐保定及天津兩處，實際以駐天津時爲多），兩江駐江寧，閩浙駐福州，湖廣駐武昌，四川駐成都，陝甘駐蘭州，兩廣駐廣州，雲貴駐昆明。總督之中，以直隸兩江二缺爲最重要，直隸居督撫之首席，兩江則地廣事繁，鹽、漕、河三大政及海防、

江防均屬其職責，皆非重臣不居此任。閩浙與雲貴二缺爲最輕簡。總督有節制文武之權，明清皆以制台、制軍爲通稱（見黃本驥著「歷代職官表」第一九四至一九五面）。漸甫自同治四年（一八六五）至五年十一月勤檢督師爲止，署理兩江總督；自同治九年（一八七〇）八月，至光緒八年（一八八二）三月丁憂，九年六月回任直隸總督，至二十一年（一八九五）正月，二十六年（一九〇〇）閏八月，再任直督，至二十七年九月卒（見蕭一山清代通史第五冊第二二九至二三一面）。合肥領袖督撫，坐鎮天津十四年，安內攘外，堪稱人中英雄。

會李淵源。文學受知

李鴻章之父文安，號愚荃，與曾國藩（一八一——一八七二）是同年進士，李官部曹，而曾官翰林。翰林工作清閑，故有充分時間鑽研學問，因此奠定了曾氏一生事功的基礎。李鴻章能得這樣一位父執來作老師，自然求學做人，兩得其益。梁啟超（一八七三——一九二九）說李鴻章「初以優貢客京師，以文學受知於曾國藩，因師事焉。日夕過從，講求義理經世之學，畢生所養，實基於此」（論李鴻章，中華書局版，第十二面）

。此地所謂「文學受知」，尚有一段故事。據近人徐一士說，曾見某筆記中記載，李鴻章居曾幕時，嘗爲曾國藩草一奏疏，嚴劾安徽巡撫翁同書，最得曾氏器重。當時曾氏因翁同書對練苗沛霖採取招撫政策，以致失陷封疆，他本人又在定遠失守之時，棄城逃走，有愧方面大吏的守土之責，極爲憤慨，意欲具疏奏劾，而難於措辭。緣翁同書乃咸豐皇帝（一八三三—一八六二）時體仁閣大學士翁心存（一七九二—一八六二）的長子，翁心存在皇帝面前，「聖眷」甚隆，且門生故舊，佈滿朝列，易爲翁同書說項，頗爲躊躇。別人擬稿，均不愜意，自己動手，亦難妥當。最後李鴻章代擬一稿，文意周密，中有一段，尤爲警策。原文說：「臣職分所在，例應糾參，不敢因翁同書門第鼎盛，瞻顧遷就。」這段話方剛嚴正，不但使同治皇帝（一八五六一—一八七四）及兩宮皇太后無法徇情曲庇，也使朝臣之袒翁者，爲之鉗口奪氣。所以曾氏看了之後，大爲激賞，即以其稿入奏，翁同書旋即奉旨革職拿問，遠謫新疆，客死戍所（凌霄一士隨筆）。就事論事，李氏此稿深得奏文「辣」字訣，使人無法置辯。漸甫有此吏才，方使曾氏對他刮目相看。另一方面，翁同蘇貴顯之後，利用狀元宰相，同治光緒天子（一八七二—一九〇八）兩代帝師、協辦大學士兼軍機大臣及總理各國事務大臣的優勢地位，對李難消宿恨，公報私仇，除對北洋海軍刁難掣肘之外，更在甲午（一八九四）之役，明知國力未充，不能用武，偏要竭力反對李氏和議，提

倡對日開戰，以爲打擊李氏之計，這真是李氏收之桑榆，失之東隅了。

早餐之會。借題磨練

曾國藩爲了陶冶李鴻章的志氣，並爲培養其領導才能，他實在需要把李鴻章留在營中，以便遇事歷練，隨時給予啓示和訓誨。清代桐城巨子薛福成（一八三一—一八九四）曾有文記一具體事實：「合肥傅相肅毅伯李公……聞曾文正公督師江西……，入居幕中。文正每日黎明，必召幕僚會食，而江南北風氣與湖南不同，日食稍晏，傅相遂不欲往。一日以頭痛辭。頃之，差弁絡繹而來；頃之，巡捕又來，曰：『必待幕僚到齊乃食』。傅乃披衣踉蹌而往。文正終食無言，食畢舍箸，正色謂傅相曰：『少荃既入我幕，我有言相告。此處所尚，惟一誠字而已』。遂無他言而散，傅相爲之悚然。蓋文正素諗傅相才氣不羈，故欲折之，使就範也。傅相初學書記，繼司批稿、奏稿。數月後，文正謂之曰：『少荃天資，於公牘最相近，所擬奏咨函批，皆有大過人處，將來建樹非凡，或竟青出於藍，亦未可知』。傅相亦自謂，從前歷佐諸師，茫無指歸，至此如識南針，獲益非淺。」（見「庸菴筆記」）。

同治元年（一八六二），曾國藩受命爲兩江總督，節制江蘇、安徽、江西、浙江等四省軍務，以「才大心細，勁氣內斂」的評語，推薦李鴻章爲江蘇巡撫（見「庸菴筆記」）。梁啟超說：「自同治元年，以迄光緒二十七年（一九〇二），凡四十年間，李鴻章無一日不在要津。其可稱

爲開散時代者，則乙未（一八九五）三月，至丙申（一八九六）三月間，凡一年。戊戌（一八九八）八月，至庚子（一九〇〇）八月間，凡兩年而已」（論李鴻章第六十八回）。有了這種知遇培植之恩，所以「李鴻章接人常帶傲慢輕侮之色，俯視一切，挪揄弄之，惟事曾文正如嚴父，執禮之恭，有不知其然而然者」（見「論李鴻章」第八十四回）。

平定蘇常。不搶人功

曾國藩與太平天國作戰時，時苦糧餉不繼，適有上海士紳到安慶乞師，東援上海，許每月助餉銀十萬兩，用火輪船解至九江，四日可到，文正於咸豐十一年（一八六一）十月間，曾寫信給他九弟國荃（一八二四—一八九〇），欲以國荃爲東援上海的主帥（原信見臺灣學生書局所影印出版的「湘鄉曾氏文獻」，該信並未收入曾文正公全集），國荃不願，復信說是「恐歸他人調遣，不能盡合機宜，從違兩難」。其意明爲不願接受江蘇巡撫薛煥（一八一五—一八八〇）指揮，實際意圖則是「賊巢在金陵，急攻其巢，必以全力授救，而後蘇杭可圖，願任其難者」（見曾國荃年譜復國藩書）。由於國荃不願，曾國藩才改選李鴻章爲援滬軍的主帥。薛福成說：「會巡撫（薛煥）爲言路所劾，朝廷密令曾公慮能撫蘇任者。乃薦今伯相合肥李公，欲令開闢淮軍風氣，以彌楚軍之闕」（見庸菴文編）。湘淮代興，於此已見端倪。

同治元年三月三十日，鴻章率領淮軍八千人

抵滬，得旨署理江蘇巡撫。由於淮軍部將驍勇堅忍，加以洋人助戰，所以李鴻章轉戰各地，大小數十戰，始於松江，終於嘉興常州之役，中經虹橋之捷，淮軍以三千人破太平軍十餘萬之衆，使外兵爲之顛舌驚嘆。至同治三年（一八六四）四月，平吳功成，時僅兩載。

當初上海外人，對清及太平天國之戰，嚴守中立態度，迨咸豐十年（一八六〇）七月，李秀成（一八二一—一八六四）進攻上海，外商感受太平軍的直接威脅，始由美人華爾（E. T. Ward 1831-1862）組織洋槍隊，自任統領，初爲五百人，一戰而得松江，軍聲大振。同治元年正月，洋槍隊協助淮軍，敗李秀成於浦東，二月再敗太平軍於上海西南之泗涇，於是改洋槍隊爲常勝軍。八月華爾戰死慈溪，由美人白齊文（Burgvine）繼任統領。嗣因白通敵並掠奪餉銀四萬兩被黜，乃以英國將官戈登（G. G. Gordon 1833-1865）代之。當時常勝軍人數五千，歐洲軍官一百五十人，裝備新式，士氣旺盛，於同治二年（一八六三）四月以後，連克太倉、崑山、嘉興、吳江。所以李氏平吳，常勝軍之功，確不可沒（參見李方農著「中國近代史」第一三三三至三三五五）。

同治三年（一八六四），南京指日可下之時，朝廷有命李鴻章會同曾國荃進攻南京。李氏奉令之後，推三阻四，遲遲不行。清廷大怒，欲加懲處，曾國藩連忙上疏，代爲解釋：「李鴻章平日任事最勇，進兵最速，此次會攻金陵，稍涉遲滯，蓋無避嫌之意，殆有讓功之心。」（見譚

慧生編著「歷代偉人傳記」下冊第二三〇面）。意思是說曾國荃圍攻南京，已勝利在望，是以李氏不願投機取巧，分曾國荃的功勞。果然六月十六日正午，南京即被曾國荃攻下，他因此被賞加太子太保，賜封一等伯爵。按湘軍之所以能克敵致果，並非曾國荃一人之功，李鴻章底定蘇常，始使困守南京的太平軍，餉源兵力，都成了孤立之勢。所以李鴻章對平定太平天國之亂，也曾建立了不少汗馬功勞。梁任公先論此事說：「非圍金陵，則不能牽（制）江浙之敵軍，而李文忠新造之軍，難遭制勝。非攻江浙，則不能解（除）金陵之重圍，自曾忠襄久領之軍，無從保全，諺史不可不於此着眼焉」（論李鴻章第十九面）。

嗣論李鴻章爲人說：「案此亦李文忠之所以爲文也，詔（令）會動而不欲分人（之）功於垂成，及事定而不懷嫉妬於薦主，其德量有過人者焉，名下無虛，非苟焉已耳」（見「論李鴻章」第二十六面）。

消滅捻匪。謀定而動

捻黨起源於皖豫魯鄂間，這個秘密結社的組織叫做「捻」。他們初是捻紙燃脂爲龍戲，稱爲拜捻，不過是爲了行帷逐疫。到了後來便成爲無賴流氓，藉以報仇詐財的不法集團了。他們聚數人爲一捻，或數百人爲一捻，呼爲「捻子」。

咸豐元年（一八五一），太平軍起義廣西，北方魯豫皖的失業農民，多結捻爲生，幾至民捻不分。他們居則爲民，出則爲捻，到處劫掠。當時著名的捻黨首領有張樂行及興德樹等。咸豐三年（

一八五三），太平軍奪取南京，林鳳祥與李開芳率軍北上，捻黨響應太平軍。咸豐九年（一八五九），主辦團練的苗沛霖叛變，受太平軍冊封爲北平王，遂與軍捻合流。同治元年（一八六二）皖豫捻黨入陝，魯直捻亂又熾，京師震動（參見李方農中國近代史第三六三至三六四面）。梁任公列舉捻亂初起，清廷迭次所派平捻統帥，自善祿至僧格林沁共二十一人（見「論李鴻章」第二十七至二十八面）。僧王於同治二年（一八六三）擒殺張樂行，樂行之子張總愚，活動於豫鄂一帶。同治四年（一八六五），僧王追捻於曹州，四月二十五日，被捻黨誘入重圍，至森林中被殺。

僧王既死，清廷改派曾國藩爲統率直隸、河南、山東三省兵力負責勦捻的欽差大臣，又命江蘇巡撫李鴻章署理兩江總督，爲曾國藩辦理後路糧台。曾氏受命以後，始畫「長圍圍制」之策，謂必覓敵一隅，然後可以聚殲。當國藩初拜大命之始，即以湘軍暮氣漸深，恐不可用，故漸次遣撤，惟用淮軍殺敵。其意欲虛此席以待李鴻章之成功，所以到同治五年（一八六六）十二月，即以疾辭。李鴻章代爲欽差大臣，國藩回江督本任，籌辦後路糧餉。鴻章繼承原則，遂定中原。湘淮代興，曾李更迭，至此成爲事實。余曾有詩評李云：「事事湘鄉薪火傳，動名近代已空前，中堂物望權威重，得意春風四十年」。

梁任公說：「鴻章則捨方略，以爲捻賊已成流寇，偏之不流，然後會師合剿，乃爲上策。明孫傳庭（一八五九—一八六四）謂「剿流寇當

之於必困之途，取之於垂死之日；如但一彼一此，爭勝負於矢石之間，即勝亦無關於蕩平」。鴻章即師此意，故（同治）四年十一月曾奏稱：「須覓之於山深水複之處，棄地以誘其人，然後合各省之兵力，三四圍困之」。後此大功之成，實由於是」（「論李鴻章」第二十九圖）。

同治五年（一八六六），捻黨分爲東西二股，西捻入陝，以張總愚爲首；東捻出沒於豫、鄂、魯、蘇，以任柱、賴文光爲首。同治六年（一八六七），淮軍劉銘傳（一八三六一一八九五）破捻軍，任柱被其部下潘貴升所殺。賴文光被清軍鼎豐部圍於揚州，後被擒殺，東捻遂滅。同年六月，李鴻章敗張總愚於海豐，張爲清軍窮追，投徒駭河水死，其子侄亦被殺。西捻至此，亦告肅清。捻亂始於咸豐元年，終於同治六年，先後十六年（一八五一—一八六七），蹂躪地區，南至長江，北達黃河，到處劫掠，民不聊生，少荃安定地方，萬家生佛。

梁任公對李鴻章實行堅壁清野，消滅捻患，曾加評論說：「鴻章之用兵也，謀定而後動，料敵如神。……其剿捻也，以十餘年剽悍之勁敵，羣帥所束手無策者，亦一歲而殲之，蓋若有天授焉。其待屬將也，皆以道義相交，親愛如骨肉，故威樂爲用命，真將將之才哉！……其平捻也，一承國藩所定方略，而所以千里饋糧，士有宿飽者，又由有江督在其後，無狼顧之憂也。不寧唯是，鴻章隨曾軍數年，砥礪道義，練習兵機，蓋其一生立身行己，耐勞任怨，堅忍不拔之精神，與其治軍取將，推誠佈公，團結士氣之方略，無

一不自國藩得之。故有曾國藩，然後有李鴻章，其事之如父母，敬之如神明，不亦宜乎？」（見「論李鴻章」第三十二至三十三圖）。

自強運動。學習洋務

洋務是甲午（一八九四）以前所通用的名詞，凡奏摺、公文、論說、條陳均用之，其意大約是指關於洋人的事務而言。所謂洋人的事務，如製槍炮、設船廠、遣留學、立學校，無一不是爲辦海防而設，即所謂以「夷器制夷」。不過以前只有海防的理論，到曾國藩始有洋務的事實，此種覺悟，完全是由西洋的壓迫而來。因爲辦理洋務，遂逐漸發展成爲自強運動（見蕭一山著「中國近代史概要」第二〇七圖）。

自強運動發起於恭親王奕訢（一八三二—一八九八）和文祥（一八一八—一八七六），倡行於曾國藩，而李鴻章始終主持其事。奕訢和文祥從英法聯軍的經驗，得到了三種教訓：（一）他們確切地認識，西洋的軍器和練兵方法，遠在我們之上。（二）西洋人不但願意賣軍器給我們，而且願意把製造軍器的秘密及訓練軍隊的方法教給我們，這是我們自強的機會。（三）西洋人並不是他們以前所想像的那樣，狼子野心，不守信義。英法軍隊雖然佔了北京，但北京條約訂了以後，英法居然依據條約，撤退軍隊，交還首都，足見西洋人也守信義。從這三種教訓，他倆訂了一個新的大政方針：（一）決定以夷器和夷法來對付夷人。（二）在自強沒有達到預期的程度以前，中國應該謹守條約，以免戰爭（參見蔣廷黻著「中國近代史大綱

第六十九至七十圖）。按文祥是滿人，於一八五八年入軍機處。恭親王是咸豐的親六弟，同治的親叔，於一八五三年入軍機處，成爲掌印領班的軍機大臣，地位是全朝最親貴的。有了他們的決心和資望，於是他們在京內成了自強運動的中心。又軍機處成立於雍正十年（一七三二），執掌重要機密。從此軍機大臣代替明成祖（一三五九—一四二四）以來的內閣大學士，成爲新的宰相，領班軍機大臣成爲新的首席宰相（參見黎東方著「中國近代史」五十六至五十七圖）。

清代自強運動，由於受了英法聯軍失敗的刺激，目的是想富國強兵，方法則根據魏源（一七九四—一八五六）的「師夷之長技以制夷」（語見其「海國圖志」序文）。文祥與奕訢鑒於外患日深，爲應付國難，統籌洋務全局，曾奏擬善後章程六條，被清廷採納。此一措施證明清廷已知夷務重要，須設官專辦，並須學習外國語文，閱讀外國報紙，始能通曉夷情。然而當時還不知道學習夷技，以制夷人。在對太平軍作戰時，淮軍藉常勝軍之助，贏得戰爭的勝利。此種經驗使李鴻章認識了「開花大炮」之堅利，遂主張採用夷技，使用西洋武器，這便是李氏「師夷之長技以制夷」的動機。李氏深信「中國但有開花大炮（及）輪船兩樣，西人即可歛手」（見同治二年李鴻章致曾國藩書）。同治四年（一八六五）八月，奏請在上海設立江南機器製造局，他自認他的洋務見解，「如病方亟，不得不治標」。該局仍以「製造槍炮，藉充軍用爲主」（並見李文忠公奏稿置辦外國鐵廠機關摺）。同治十一年（一八

七二），清廷以經費困難，成效不大為辭，擬將同治五年（一八六六）設立的福建造船廠停辦，李鴻章竭力反對，因他已認識時代在變，為「三千年來一大變局」（語見李文忠公奏稿「籌議製造輪船未可裁撤摺」）。他的見解不但高明，並有應變的智慧。其他士大夫固於章句之學，昧於大勢，生活於五里霧中，只知空口喊着攘夷，而不去想有效辦法，還反對學洋文，讀洋書，殊不知不學洋文，便不明夷情，不讀洋書，就不知夷技；不明夷情夷技，如何能驅逐洋人出境？不能制夷，怎能做到禦侮圖存？

模仿西法，當然需要充分的西方知識，曾李二氏爲了模仿西法，遂決定三種方法，大量吸收西學：一爲創辦學校，二爲翻譯西書，三爲派遣幼童出洋留學。曾李二氏模仿西法的重點，在輪船槍炮的製造，所以他們辦學校，也辦武學校，譯書也翻譯與軍工有關的書，派遣留學生也規定學習製造輪船槍炮的技能。就是他們創辦的新學校，成立的譯書機構，也多在他們所創辦的機器局或製造局內，附屬辦理。因爲他們辦學校所訓練的學生與翻譯的資料，都與他們的機械局、製造局的業務有關。他們決定吸引西學的政策，是配合西法模仿的。

自太平軍瓦解，至中日甲午戰爭失敗，其間共三十年（一八六四——一八九五）這三十年是中國的工業革命，也是現代化的先聲。不過當時中國工業革命發生的原因，發展的年代與程序，均與英國不同：（一）英國的工業革命是自發的，即國內紡織工業的生產，不足以供應世界市場的需

要，才產生工業革命；而中國是被動的，因爲受到列強壓迫，才積極地模仿西法，進行洋務，結果發生了工業革命。（二）英國工業革命發生於十七世紀初期，到十八世紀後半期，已達成熟階段；而中國自同治年間曾李倡導模仿西法，以機器代替人工之時起，直至今日，尚未完全完成。所以中國比英國落後了一個半世紀。（三）英國使用機器，先用於紡織等輕工業，後來生產過剩，須向國外推銷，爲了掠奪市場，保護商業利益，才注重軍事工業，以武力爲發展工商業之後盾；中國工業革命一開始，便是製造槍炮，抵禦外侮，然後才注意到發展輕工業。所以說英國工業革命的路線，是先富國而後強兵，中國則先強兵而後富國。

富國強兵。功敗垂成

中國工業革命的萌芽時代，始於一八六五年創設江南製造局，終於北洋艦隊沉舟於大東溝之役。這個洋務運動前後三十年間，經曾國藩、左宗棠（一八一二——一八八五）、李鴻章、張之洞（一八三三——一九〇九）諸氏之竭力倡導，規模得以粗具，古老的中國社會微露新興的氣象。但李鴻章一手促成的西法模仿，成績大半毀於甲午一役，檢討其失敗原因，大約有四：（一）舊勢力的梗阻：當時保守的士大夫如倭仁等，根本鄙視洋務，極力排斥西法，主張唯古是尚，才算文明禮義之邦。這種守舊思想，阻礙洋務運動的推行，使模仿西法的人，不能放手去做，績效當然不盡理想。（二）列強掠奪的加緊：在李鴻章推行新政期內，帝國主義者正掠奪中國的邊疆，如日侵

琉球，法侵安南，英侵緬甸，俄侵伊犁，使清廷應付不暇，未能全力從事洋務，這是西法不能盡力模仿的外在因素。（三）新政人物的偏狹：李鴻章主持洋務的時間最久，舉辦的洋務最多，但因他的見解偏狹，專門注意軍事工業的建設，而疏忽了國計民生方面的發展，未能把學習洋務的範圍擴大，以致結果大打折扣。（四）黑暗勢力腐蝕洋務：創辦任何一種事業，一須經費充足，二須人事健全，兩者缺一不可。光緒十四年（一八八八）詔修頤和園，以爲慈禧太后（一八三五——一九〇八）歸政後頤養之所；十五年以後，未增一鎊，影響海軍的發展；當時主持的官吏，皆視新興的工業爲肥缺，乘機中飽，貪污風氣腐蝕了一切，尤以北洋海軍爲甚，後來的海軍衙門，簡直變成宮廷的侍從室了。

中國初期工業革命三十年，使中國社會呈現了四種顯著的變化：（一）大都市的興起：曾李李張諸氏爲了創辦洋務的方便，把各種新式的工廠都設在通商口岸，於是商埠附近的農村人口，漸向工商業發達的地區集中，如上海及漢口等地，便成爲工商業繁榮，文化發達的都市了。（二）農民變成工人：中國以農立國，農民佔大多數，因爲新式工業興起，農民逐漸放棄田園工作，加入工廠，以勞力換取工資，維持生活，於是農民變爲勞動者了。（三）新型士大夫出現：曾李爲模仿西法，派遣各省子弟留學，這些留學生學成歸國，參加新式工業，成了工程師，參加教育，成爲教師。這些工程師和教師，則爲新型士大夫，是中國社會出現的新知識份子。（四）資本主義傾向：模仿西

法三十年，新工業、新學校和新的士大夫統統出現了，雖然範圍不大，創辦不多，但是已給中國社會播下了變化的種子，到中日甲午戰後，世界資本主義的勢力侵入，官商合辦的工業漸多，使中國社會發生了遽烈的變動，表現了資本主義的趨勢（以上參見李方農著「中國近代史」第三八六至四〇八面）。

外交生涯·望重國際

李鴻章的生涯，半在外交。他因外交負重望於國際，也因外交在國內大受誹謗。所以我們可從外交的角度，來判他的功罪。少荃所辦外交甚多，茲僅以天津教案、中日戰爭及中俄密約，加以評議，以概其餘。

李鴻章辦外交，以天津教案為首。同治九年（一八七〇）八月，天津人民以民間宣傳天主教堂遣人迷拐幼孩，挖眼剖心，作點眼和藥之用。又以義塚內屍骸暴露者，皆教堂所棄，於是人情洶洶，焚毀法國領事館，法人藉端要挾，並聯英美，以迫我國。曾國藩方任直督，深知此事之錯在我，乃曲意彌縫鎮壓津民，正法八人，議罪二十餘人，而法人之心猶未滿足，必欲重索賠償，且須將天津知府和知縣置諸重典。國藩應付之術，舉國欲殺。於是通商大臣崇厚恐事決裂，請免國藩而以鴻章代之，明詔敦赴任，是為李氏獨當外交衝要之始。

當李鴻章甫任直隸總督，普法戰起，法人倉皇自救，不復他及，而歐美各國亦復奔走相顧，研究西方問題，於是天津教案，不了了之。中國

當時之人，無視世界大局，不知國際情勢，以為李氏聲望稍略，過於曾氏，於是李氏身價頓增。鴻章從此破浪乘風，鵬程萬里。

中日甲午戰爭，源於韓國，戰爭結果，中國海陸兩軍均歸敗北，終以馬關條約結束。甲午戰爭中北洋海軍之敗，約有四因：（一）船速炮利，不如日本；（二）彈藥準備不足；（三）北洋海軍軍紀廢弛，高級軍官缺乏圖志；（四）統帥非人，指揮失當（參見莊綬著「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」中冊第三十九面）。韓境陸軍之敗，源有二端：（一）將帥闕冗非人，其甚者如衛汝貴趕打軍餉，臨陣先逃；又如葉志超節敗為勝，欺君邀賞；此等將帥臨敵，安得不敗？（二）統帥六人，職權相等，無所統攝，故軍勢渙散，呼應不靈。此役為李鴻章用兵失敗之始，而准軍往日英名，至此亦掃地以盡了（見「論李鴻章」第四十七面）。

馬關之耻·俄京秘約

甲午戰敗，清廷原派張蔭桓（一八三七—一九〇〇）及邵友濂為專使，日本以其人微言輕，拒而不納，乃更派李鴻章為頭等全權大臣，於光緒二十一年（一八九五）二月隨帶參贊李經方等，乘輪赴日，遙見馬關，賦詩寄慨：「萬頃波濤離海澱，天風浩蕩白鷗閑。舟人那識傷心處，遙指前程是馬關！」該詩境界開闊，音節蒼涼，

人謂鴻章實國，誰知名滿天下，謗亦隨之？二十四日抵馬關，與日本全權大臣伊藤博文（一八四一—一九〇九）及陸奧宗光（一八四三—一八九四）開議，以停戰條件三談不得要領。二十

八日李於歸途被日人小山豐太郎襲擊，彈中左頰，一暈幾絕。自古兩國交兵，不斬來使，而使被刺，輿論譁然。於是議和進度，隨之加速。日意欲取出槍子，鴻章以國事為重，毅然拒絕。翌日猶見血滿袍服，李氏自言此血所以報國。其忠勇慷慨之氣，有過人者。余亦有詩論李此後情勢云：「洋務知名圖自強，船堅炮利固金湯。馬關約後無顏色，集謗難言因夕陽」。

馬關條約簽後，俄德法各有居心，相借要求日本歸還遼東半島，日本自思不敵，唯有答應，嗣以白銀三千萬兩贖回遼東。光緒二十二年（一八九六）俄皇尼古拉二世（Nicholas II 1868-1918）行加冕典禮，帝俄政府向我表示，中國應派頭等大員去作代表，才算給朋友面子。中國乃派李鴻章為慶賀加冕大使，李氏既抵馬賽，俄派侯爵吳克托穆斯基（Ulho Meiki）率艦迎接，由俄當時國務總理徵德（S. J. Witte 1849-1915）招待。李氏外交素持「以夷制夷」政策，他與徵德簽訂密約，俄許援助中國抵抗日本，華許俄國建築中東路。徵德本意並非要援中國，不過是要利用中東鐵路，侵略中國。以後各國在華劃分勢力範圍，日俄戰爭，二十一條，九一八這些國難，都是那個密約引出來的！

故師大程發軔教授分析俄人擅長製造分裂，趁火打劫及實行糖衣外交，以致先後蠶食鯨吞我國領土二百一十九萬七平方公里。若以臺灣面積三萬六平方公里比較，則我國失地之廣，約等於六十一個臺灣，佔我國總面積五分之一強。所以如此，由於以往無人才，無地圖及無政策（見其

「中俄國界圖考」第二七二至二八三圖)。當時以李鴻章之雄才大略，明察秋毫，尙受其欺，其他可以想見了。來日光復大陸，尙須設法收回失土，俾使我國疆域完整。

俄人脅誘。憂憤而亡

一、晚節芬芳：李鴻章在商談結束八國聯軍之辛丑和約期間，受盡侮辱，條約訂後，他終於積勞病倒。在義和團之亂時，俄國乘機出兵東北，威脅盛京將軍增祺，訂立旅順密約，企圖將東北置於俄國保護之下。消息傳出，清將增祺革職。俄復將我國駐俄公使楊儒騙到俄國外交部，強迫楊儒立刻在條約上劃押，楊儒不允，竟被俄人將其由樓上踢下，墜地而死，其子也跟着自殺。俄人轉向李鴻章增加壓力，李氏臥病在床，不堪徵德駐京代表鮑斯尼夫 (Postniev) 威脅利誘，軟硬兼施，李氏憂憤交加，回天乏術，終於辛丑年(一九〇一)九月二十七日，病逝北京，享壽七十九歲。李氏最後十年，仍持「以夷制夷」政策，力主「聯俄制日」，誰知俄人豺狼成性，唯知擇人而噬，俄竟竟送俄手，李氏死而有知，相信亦將長嘆所遇非友。

察哈爾省懷來縣知縣吳永當時有文記李死事，他於九月二十六日記：是日得李傅相自京電奏：「病勢危篤，請速派大臣接替，以資鎮懾」。兩宮得奏，甚為慮念。太后曾召予，語及，至為之流涕，謂：「大局未定，倘有不測，如此重荷，更有何人分擔」。二十七日續記：辰刻自汜水縣起鑾，未刻行抵開封府之榮陽縣駐驛。旋得京

師來電，合肥相國已於今日午刻逝世。得此噩耗，兀如片石壓入心坎中，覺眼前百卉，立時皆呈慘色。聞兩宮並震悼失次，隨扈人員以及宮監衛士，無不相顧錯愕，如樑傾棟折，驟失倚恃者。至此等關鍵，乃始知大臣元老為國安危之分量。想此時中外朝野，必同抱有此等感想，即平時極力詆毀之人，至此亦不能不為之扼腕，公道所在，殆不可以人力為也。公之隆助偉績，自表表在人耳目。晚年因中日一役，未免為輿論所集矢。然自此番再起，全國人士皆知扶危定傾，拯此大難，畢竟非公莫屬，漸黨譽多而毀少。黃花晚節，重見芬香，此亦公之返照也(見其「庚子西狩叢談」)。

忍辱負重。衰恤優隆

二、柱石重臣：辛丑年十月初三日，清廷頒發詔諭云「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，以儒臣起家軍旅，早膺疆寄，晉贊綸扉，輔佐中興，削平大難。嗣在北洋卅餘年，辦理交涉，悉協機宜。上年京師之變，事機萬緊，該大學士忠誠堅忍，力任其難。宗社復安，朝野依賴。本年七月間病，疊經降旨慰問，該大學士仍力疾從公，未敢休息，忠靖之忱，老而彌篤。方冀調理就痊，長資倚任，乃驟患咯血，遽致不起。當茲時局艱難，失此柱石重臣，披寬遺章，曷勝愴慟。前已加恩賜卹，予諡文忠，追贈太傅，晉封一等侯爵，入祀賢良祠，着再賞銀五千兩治喪，由戶部給發，原籍及立功省份，着建立專祠，並將其生平戰功政績宣付國史館立傳。靈柩回籍時，沿途地方官妥

為照料。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，應得卹典該(管)衙門查例具奏。伊子李經述着賞給四品經堂，承襲一等侯爵，李經邁着以四五品經堂用，李經方服闋後，以道員遇缺簡放。伊孫李國杰着以郎中即補，李國燕、李國煦着以員外郎分部行走，李國熊、李國燾着賞給舉人，一體會試，以示篤念蓋臣有加無已之至意」。廟堂之文，畢竟典重，今日讀來，猶為動容。李氏為國忠勤，報亦優崇。

三、忍辱負重：清史稿曾論李鴻章云：「中興名臣與兵事相終始，其助業往往為武功所掩。鴻章既平大難，獨主國事數十年，內政外交常以一身當其衝，國家倚為輕重。名滿全球，中外震仰，近世所未有也。生平以天下為己任，忍辱負重，庶不愧社稷之臣。惟才氣自喜，好以利祿驅衆，志節之士，多不樂為用，緩急莫恃，卒致敗誤。疑謗之起，抑豈無因哉！」(見「李鴻章列傳」論)。評論堪稱公允。

國際推崇。國人褒貶

四、外人批評：德皇威廉第二 (William 1869-1941) 稱李鴻章為「東方之俾斯麥」(P.O. E.L. Von Bismarck 1815-1898)。(見徐一士撰凌霄一士隨筆)。縱威氏擬推銷軍備，故加諛辭，亦可見彼心目中兩大名相，東西輝映。帝俄國務總理德伯爵認為：「余之職位關係，嘗使余得與許多大政治家相識，而且其中並有數人乃係歷史上之不朽人物。在此大政治家之中，李鴻章之風度，却使余所得印象特深。此人真可稱

為一位大政治家，彼是一位中國人，絲毫未受歐式教育，但在他方面深具中國學識，尤其是具有一個極為健全明白之頭腦。彼在中國歷史及政府之中，關係極為重大，蓋在實際上，彼可算是真正統治中國者也」（見王光祈譯李鴻章遊俄紀事，中華書局版，第十七回）。

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嘗評李鴻章，謂彼有豪膽，有逸才，有決斷力，且為伶俐有奇智，妙察事機利害得失之人。日人德富蘇峯在日報發表專文，認為陸評鐵案不移。該文已經梁任公譯為中文，附於「論李鴻章」書內。

五、褒貶兼施：光緒二十七年（一九〇一）十一月，李鴻章死後二月，梁任公曾仿漢司馬遷（前一四五——前八六）寫史記伯夷列傳、屈原列傳及貨殖列傳夾敘夾論之先例，為李鴻章作了一篇六萬字的評傳，名曰「論李鴻章」，其總結要點，約略如下：（一）敬李鴻章之才，惜李鴻章之識，悲李鴻章之遇。（二）李鴻章為中國近四十年第一流緊要人物。（三）李鴻章為時勢所造之英雄，非造時勢之英雄。（四）李鴻章不學無術，故不能為非常之英雄。（五）凡人生於一社會之中，每為其社會數千年之思想、習俗、義理所困，而不能自拔，李所遭非女子即小人，致使其志不伸。（六）中興諸大臣——聲望之特達，以李鴻章為最遲，而其成名之高，當國之久，亦以李鴻章為最盛，事機滿天下，時勢造英雄，李鴻章固屬時代之驕兒。（七）李失敗之故，由於羣議之掣肘者半，由於鴻章之自取者亦半。（八）李鴻章必為數千年中國歷史上一人物，亦必為十九世紀世界史上一人物。（九）崇拜

西人之劣根性，為鴻章所無。（十）李鴻章有才器而無學識，有閱歷而無血性，彼非無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心，然彼彌縫偷安，待死而已，彼於未死之前，當責任而不辭，然未嘗有立百年大計，以遺後人之志。任公筆鋒常帶情感，下筆不能自休，兼施褒貶，字挾風霜，即起李氏於地下，恐怕也要認為事理分明，不容強辯了。

六、綜合論斷：

（一）李鴻章師事曾國藩三十年，平生治軍處事，榮性顯晦，不易常度，都得力於曾國藩的陶冶。而智術機警，識力善變，勇於任事，不畏艱險，血氣比較高強，是其修養特點。

（二）李鴻章志大才高，有類於左宗棠，勁氣內斂，受教於曾國藩，兼有曾國藩之長。

（三）李鴻章支持晚清的政局，身任外交的要衝，其眼光毅力，都值得我們佩服。他的世界知識

，國事見解，都比較一般人高，他是推行自強運動的中心人物，練淮軍要用洋槍，辦交涉要顧現實，足見較具現代眼光。

（四）李氏長短：不學無術，不敢破格，因循苟且，喪權辱國，是其所短；不避勞苦，不畏謗言，盡瘁國是，膽識過人，是其所長。

（五）沒有培植人才：李居當道凡四十年，自視甚高，與其部屬，昔同患難，今共功名，徇其私情，轉向汲引，布滿要津，委以巨任，不問其才之可用與否。又好以利祿驅眾，亮節之士，多不樂為用，所以沒有培植什麼人才。這是他緩急莫恃，貽誤事機的最大原因。

（六）重視關係：李重視部屬鄉里，才造成袁世凱（一八五八——一九一六）及段祺瑞的北洋系，為中國軍隊添封建割據之觀念，為中國社會長貪污循私之風習。（選自時代文摘）

由豪傑到裁縫

吳崇蘭女士著
定價臺幣壹佰元

本書由名作家吳崇蘭執筆，奇人修廣翰口述九一八東北淪陷，日本奴役同胞迫害志士的殘酷暴行，以及日本敗亡中共乘機擴大叛亂，大陸淪陷衝出鐵幕，回到自由祖國就業創業，三起三落，天助自助的感人故事，驚險緊張，高潮疊起，令人目不暇給，在中外雜誌連載期間極獲好評，現已出版單行本，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80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